

● 开放丛书

中青年学者文库

李学勤集

—— 追溯 · 考据 · 古文明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李 学 勤 集

——追溯·考据·古文明

李学勤 著

黑 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

1989年·哈尔滨

李学勤集

——追溯·考据·古文明

李学勤 著

责任编辑：高质慧

封面设计：安振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3.25·插页2·字数310千

1989年5月第1版·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16-0688-7/G·548 定价：5.50元

自序

在这本文集辑成之际，要向《开放丛书》编委会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前几年，我曾把以往写的一部分论文编成两本集子。一本的内容是专论青铜器的，题为《新出青铜器研究集》，另一本则涉及古文字学几个分支，题为《古文字学论文集》。两集所收论文的时间，下限都在1983年，加在一起凑到百篇之数，将由文物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出版。现在这本集子，所辑论文大多数是那两本集子未收的，而且多为我1984年以后的新作。

按照丛书的要求，文集应比较全面地反映作者的学术思想和走过的道路。我这个人兴趣相当广泛，所学杂而不纯，又由于工作经历关系，从事过不同方面的研究，写过的东西很难理出一条思想发展的线索。不过，在编辑这本文集的过程中，重读历年发表的拙文，还可以看出一些较为固定的看法在逐渐形成。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为了使自己的探索能多少深入一点，我有意地将研究范围限制了，从而有的看法也表达得集中一些。

我研究的范围，也就是这本集子里四十几篇小文环绕的主题，简单说来，是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辉煌的文明之一，我力所能及的仅是其前面一段，即自文

明起源至汉初，可以说和《史记》的跨度相当。我认为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取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所谓多学科结合，是指历史学、文献学（包括传统的经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尤其要注意文献与考古的互相印证；所谓比较研究，是指以我国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对比参照，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前者我曾努力去做，后者只是在这几年才着手试探。

这本集子里收录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写于1981年，粗略地勾画了我对中国古代文明几个重要问题的见解。其他好多文章，都不妨看做该文所提观点的具体引申。汉代以前的古代文明，距离今天已很久远，当时遗留下来的信息，能为我们所接触的已经不多。虽然历代不知有多少学者费尽力量去探究，各人心目中古代的图景仍然各不相同。应该承认，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想法，和流行的观念是有较大差别的。读者不难在这本集子里看到，我若干年来反复探索的问题有这么几点：

一．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一直主张，中国文明时代的开端要比一般承认的早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1958年，我在一篇小文《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社会》中，曾推测“中国阶级社会、国家的起源应与两河区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古国一样地古老，一样地悠久”（《夏文化论文选集》132页）。近若干年又有许多考古发现，使我加强了这方面的信心。集子收录的论文，如《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论新出大汶口陶器符号》等，和这一问题有关。

二．关于商周之际文化的传统：很多论著认为商周两代存在非常剧烈的变革，商兴于东，周起于西，彼此传统不同。这

个见解和古人所说不能相合，如孔子便论及商周礼制的因袭关系，以为其间不过是部分的损益。我在集子里收录的《商青铜器对西土的影响》、《周文王时期卜甲与商周文化关系》等文内探讨了有关问题。根据周原甲骨提出的一些意见，曾在1986年日本东京“中国古文字与殷周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报告，承樋口隆康、伊藤道治、松丸道雄等教授往复讨论。

三．关于晚周秦汉间文化的传流：东周（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是政治经济的日趋分裂，同时另一方面是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秦兼并列国，使中国重归统一，但也结束了晚周百家争鸣的局面。晚周文化如何历经秦火而传流到汉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这本集子中不少论文谈到这一方面，例如《新发现简帛与秦汉文化史》、《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再论楚文化的传流》等。对学术界广泛关心的楚文化，我也试做了一些探索。

四．关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文末，曾就疑古思潮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历史影响有所讨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这一思潮的作品，服膺多年，直到近年得见大量简帛古籍的发现，才感觉有重新认识其副作用的必要。好几位前辈学者指出，处于现代的我们不宜再为清代学者强调的汉宋或今古文门户所范限，可是晚清今文一派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当前在许多方面仍起着作用。我们继承前人，必须充分吸取其优良成果，也必须超越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对古书的反思》、《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等文，都关涉这个问题。《周礼》一书，我以为是研究西周制度的必要依据，《小孟鼎与西周制度》等研究青铜器铭文的拙文，都是我这一观点的例证。

指出清代学者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我主张降低对清人研究古代成绩的评价。相反，我认为清人还有许多研究心得，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继承。其中最紧要的，我看还不在其具体论断，因为那些由于时代的进展总是要有修正的，而是很多清代学者一贯传承的学风。六十多年前，梁启超的名著《清代学术概论》称这种学风为朴学，归纳之为十点，如“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等等，今天看来还是应当遵循的。

学然后知不足。随着年龄渐长，多读了几部书，再看前些年的旧作，便觉满目瑕疵。看来古人常说的“自悔少作”，简直是不可避免的。读者审阅我这本小集，如能不弃，赐以指教，使我能有尺寸之进，就是我最大的欣幸了。

最后，谨对印刷厂不憚辛劳，把这本充满古字僻字的书印制出来，致以敬意和谢忱。

书中插图系由文物出版社李缙云配制。

李学勤

1988年7月



李學勤

作者小传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读书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1954年起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起兼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至1982年任英国剑桥大学克莱亚堂客座研究员。1985年起兼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85年当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1988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客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1959）、《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等多种及论文约150篇。

313074

D432

713(9)

李学勤集：追溯·考据·故文明/

5.50元

登 记
№

- 1 为了充分便利读者和提高图书的利用率，读者借书应按时归还。
- 2 图书不得污损、折角、涂写、撕毁或遗失，否则照章处理。

318074

№2—3

编委：

王小明 刘敏中
李景瑞 何 新
张文达 张 莉
唐 欣 高质慧
戢克非

(按姓氏笔划排列)

目 录

自序

文物研究与历史研究·····	(1)
古文字学的基础工作·····	(9)
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15)
从青铜器谈到比较文明史·····	(28)
古乐与文化史·····	(34)
对古书的反思·····	(41)
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	
——比较文明史一例·····	47
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	(54)
古玉上的鹰和人首·····	(67)
谈祝融八姓·····	(74)
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	(82)
从传出商丘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铜爵谈起·····	(92)
殷墟甲骨两系说与历组卜辞·····	(98)
商代的四风与四时·····	(104)
试论虎食人卣·····	(111)
商青铜器对西土的影响·····	(122)
周文王时期卜甲与商周文化关系·····	(133)
《世俘》篇研究·····	(142)
大孟鼎新论·····	(155)

小孟鼎与西周制度·····	(165)
应监甌新说·····	(180)
祭公谋父及其德论·····	(186)
鲁方彝与西周商贾·····	(193)
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	(200)
论西周金文的六师、八师·····	(206)
《齐语》与《小匡》·····	(217)
论芟掩治赋·····	(226)
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	(236)
关于楚灭越的年代·····	(248)
论博山刀·····	(255)
论包山简中一楚先祖名·····	(262)
长沙楚帛书通论·····	(266)
青川郝家坪木牋研究·····	(274)
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	(284)
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	(294)
新发现简帛与秦汉文化史·····	(310)
中国数学史上的重大发现·····	(322)
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	(327)
再论楚文化的传流·····	(341)
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	(351)
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	(363)
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	(372)
银雀山简《田法》讲疏·····	(380)
汉代青铜器的几个问题	
——满城、茂陵所出舍文的分析·····	(392)
影印《八琼室金石补正》序·····	407

文物研究与历史研究

文物研究究竟有什么用处？这是一个常常可以听到的问题。

收藏古代文物在我国有非常悠久的传统。西周前期的《尚书·顾命》记载，周康王即位时曾陈列宝器，有武王诛纣的赤刀以及胤之舞衣、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等等，都是前世遗物。按照《周礼》，这类珍贵物品系由专设的职官天府掌管。汉代有关记事，如汉武帝藏有齐桓公的铜器，可见崇尚古物的风习由来已久。当时还有盗掘古墓的事件，如广川王去疾发掘冢墓，见《西京杂记》。唐宋以下，公私搜集古物之风更盛，并在社会上形成了古董业及其市场。大概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人们一提到文物，很容易和玩赏联系起来。文物所具有的重大学术意义，至今在一部分人心中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历代有过许多学者，对各种文物作出很有价值的论述，但文物研究的新时代是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而到来的。现代意义的考古学是一门历史不长的新学科，十九世纪前叶创始于欧洲，而在中国则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使文物不再单纯是供收藏的古董，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文物研究能够对古代历史文化的探索作出贡献。

文物研究和历史研究有怎样的关系呢？下面试举一些例子

来说明。

文明的起源

从有无文字的历史记录来看，人类历史可分为史前时期、原史时期和历史时期。史前时期远古荒昧，尚无文字记载，只能依靠考古学及人类学、语言学的方法去研究。原史时期虽有文字记载，然数量较少，存在许多空白，文物考古材料在研究中有重要作用。历史时期已有较多文献，但文物仍可对文献记载印证补充。文物研究对于这三个时期的研究所居地位不同，而均有很高的价值。

考古学对史前时期研究的意义，是大家容易理解的。我国广大疆域上的史前史，正在田野工作中逐渐被揭示出来。上古流传下来的种种传说，在疑古思潮中曾被认为伪造。尹达同志几年前为《史前研究》创刊写了一篇《衷心的愿望》，指出这种观点的不确。他说，在考古工作中已“发现了和‘传疑时代’的某些部族里的可能有相当关系的各种不同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从地望上，从绝对年代上，从不同文化遗存的差异上，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些神话般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

中国文明是世界有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现在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古代文明有着自己独立的起源和发展。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这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而且对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围绕这一课题，可以提出农业的起源、金属器的起源、文字的起源、城市的起源、国家的起源等一系列问题。目前，我们的考古工作业已给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了不少可贵的线索。

以近年确定的裴李岗文化为例。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早于仰韶文化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据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发掘证明，这种文化的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其农业已经具有一定的发展水平。参加发掘的学者认为它可与西亚的新月形地带相比，“标志着东半球进入了‘农业革命’新时代的黎明时期”^①。

最近报纸上登载了河南舞阳贾湖发现龟甲刻划符号的消息。龟甲属裴李岗文化，刻划符号清晰明确，比西安半坡等地仰韶文化陶器的刻划符号又早了许多。我们曾经说明，根据近期外国学者的研究，古埃及文字可能是从陶器符号发展来的。新发现的龟甲符号，可能同后来商代的甲骨文字有某种联系。这种龟甲不象殷墟卜甲那样经过烧灼，但烧灼并不是用甲骨占卜的唯一方式，还有所谓“冷卜法”^②，所以不能率尔否定裴李岗龟甲可能与甲骨文间存在渊源关系。

文物与文献

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保存了大量文献，以致在世界上被称为历史的民族。古文献是否可信，每每有人置疑，这就需要用不同的手段去论证。文物常能作为一种非常有力的证据。

以文物印证文献，早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大家都推崇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上的功绩，他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便是通过研究殷墟甲骨，证明《史记·殷本纪》基本可信。由于甲骨研究和殷墟发掘，商代的存在成为不争之事实，谈这一点，今天或许有人感觉奇怪，可是在疑古思潮的年代，古史成为朦胧的空白，商代的确立实在是重建古史的奠基石。近年新发现的

周原甲骨文，又证实《史记·周本纪》所载商周关系也颇可信，周君确是商朝的诸侯之一，作过西伯。至于《夏本纪》，看来总也有被证明的机会。

这里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们不能企望古籍记述的所有事迹一一取得地下的证据。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文物，终究只能反映古代的一小部分。对于一种文献来说，如果其中某些关键的因素得到证明，或者许多要点反复经过印证，就应该相信这种文献整体大概是可信的。

例如《逸周书》中有《祭公》一篇，曾为《礼记》所引用，内容为周公之孙祭公谋父临终对周穆王的劝诫，很重要，然而很少有学者注意。篇中好多词语可与金文对照，如“用克龠绍成康之业，以将大命”，“龠”字用法同于史墙盘“龠事厥辟”；“我亦维有若祖祭公之执和周国，保义王家”，“执和”即史墙盘、师询簋的“盥斚”；“我亦维丕以我辟险于难”，也可对比毛公鼎“欲汝弗以乃辟函于艰”。这篇文章为西周原作无疑。

整本书有反复为出土文物遗存证明的，《左传》是一个佳例。《左传》所记人、地、事迹，多与考古发现的遗存和器物铭文相合，是这部要籍近来很少人再加怀疑的主要原因。

《周礼》和《左传》一样，长期蒙受怀疑的厄运，其内容也在文物研究中得有越来越多的证明，也许不久会为学术界多数所承认。

可以和文献印证的，当然不限于有文字的文物。考古发现的许多种器物，在遗存中见到的不少现象，都能与文献比较，从而丰富对历史的认识。比如在好多地点新石器文化人骨所见的拔牙习俗，已有论著以之同《山海经》、《淮南子》等书的“凿齿”联系起来。晋郭璞注《山海经》，说：“凿齿亦人也，

齿如凿，长五六尺”，主张“凿齿”即拔牙的文章多予否定。实则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一些玉器上，屡见口中出齿如凿的人面形象，虽无五六尺长，与郭璞所说还是一致的。揣想当时风俗，在拔牙后有时要安装某种獠牙，有其宗教性的含义。这种习俗，或者在考古工作中能够得到证实。

文物中的文献

不少关于中国书籍历史的论作，把甲骨文、金文、碑刻等都罗列在内，这些其实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的书籍。在文物范围中确有一部分是古代的书，如简牍、帛书、卷子抄本之类，对于研究历史自然有其特殊意义。七十年代以来，各地先后发现很多批战国至汉代的简牍和帛书，陆续整理发表，对古代历史文化的探讨是很大的推动。有些发现的影响，也许和汉晋的孔壁中经、汲冢竹书一样，要到若干年之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可能是对古书形成过程看法的修正。很多年来，关于古书真伪论辩纷纭。现在我们有幸目睹古代书籍的原貌，不难看出古书的形成都要经历较长的过程，有不少改动变化。如果用静止的观点去“审判”古书，不免造成误解。关于古书形成和传统的新认识，或许使学术文化史的好多部分要重新考虑。

新发现的简牍、帛书主要在战国到汉的时期，从而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周汉之际文化传流的真相。秦代焚书坑儒，历来被指为学术文化史上的大事，但其作用究竟如何，因为材料太少，前人未能深入论述。过去刘汝霖著《汉晋学术编年》，其卷一论汉初学术，尽力钩稽，也不过博得数页，语不能详。

竹简、帛书的新发现，刚好补充了这方面的缺环，在人们面前展开了汉初学术怎样在秦火之后重现繁荣的绚丽画卷。

这一类发现中特别引人注意的，应推云梦睡虎地竹简中的秦律和律说（《法律答问》）。此部分简只有五百余支，内容却十分丰富，以法律形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简文的公布立即使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出现崭新的局面。国内外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研究秦简的论著，盛况可以想见。令人兴奋的是，近来在江陵张家山又出土了汉律，内涵的重要不在秦律之下。最近，这批汉律的整理释文工作已基本完成，其发表将在学术界得到强烈反响是可以想见的。

科技史与思想史

文物研究与科技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彼此的研究也可说是互相依存的。科技史上的许多新论点，都来自考古文物的研究。读者只要翻阅一下杜石然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便能知其大略。

藁城台西商代铁刃铜钺的发现，是极有兴趣的事例。钺的铁刃经鉴定为陨铁，从而在考古和冶金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近来有学者指出，根据这件钺和其他一些有关器物的特点，陨铁器的加工、制作在当时曾延续一个相当时期，并逐步有所改进，这可能对冶铁术的发生具有某种影响^③。这个例子表明，我国科技史的研究不能不与文物研究相结合。目前因物质条件限制，我们还不能对文物进行全面的科学技术研究，相信不久的将来，这方面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文物研究同思想史的关系，还较少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曾说过，如果以为“考古学的收获仅代表历史上的物质文